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陆建芳 ● 主编



左 骏 王志高 ● 著

中国 玉器 通史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左 骏 王志高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 陆建芳主编 ;
左骏, 王志高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386-5

I. ①中… II. ①陆… ②左… ③王… III. ①古玉器—文化
史—中国—三国时代②古玉器—文化史—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9463号

中国玉器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SANGUO LIANGJIN NANBEICHAO 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0755-83144228）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705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5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1]，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1】}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1】}。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珩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1】}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1】}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洇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三国两晋南北朝玉器数量相对稀少，一方面固然与这一时期大中型以上墓葬多遭严重盗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国土分裂、政局动荡、战争频繁，传统的西域玉料交通运输线路经常受阻，而新的大型优质玉矿又没有探明开采。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大量沿用或改制前代旧玉，南方的东晋、南朝还出现逐渐以滑石制品替代玉器的趋势，相当一部分玉器器类、造型、装饰和琢治技术明显继承两汉传统，但亦有一定的发展，如丧葬专用之玉衣已绝然不见，器表的装饰由此前的华美趋向相对简洁，素面器所占比例较大，类似于南京石门坎东晋墓所出马头形麈尾玉柄、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所出尖状顶上设有扁长穿孔的双龙纹玦佩（心形佩）、上海博物馆所藏白玉袞带鲜卑头等一系列器形不见于前代，应该属于这一时期新创。特别是受曹魏侍中王粲改创玉佩样式的影响，这一时期组玉佩自成一格，其中曹魏、西晋、东晋、南朝一系更是一脉相承，其形制、组合等皆大异于汉代，而与隋唐、五代组玉佩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耐人寻味者还有，这一时期的后段，以组玉佩为代表的出土玉器尽管总体风格相近，但在构件数量、类型、佩系方式等方面又呈现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反映了其时因南北方政权分治，玉器发展走上了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道路，这与汉唐等大一统时代整齐划一的玉器面貌迥然不同。

显然，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处在汉、唐两个玉器高峰之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无论就出土和传世玉器的数量、类型、琢制工艺，还是从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深度、广度而言，两者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杨伯达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第9编《工艺美术编·玉器》的前言中指出：“这三百余年期间的玉器工艺美术，在我国玉器史上，是位于西汉玉器大发展和唐宋玉器大繁荣之间的一次低潮。”这个表述虽然不是很全面，但用来概括这一时期玉器的时代特点却很到位。近二十年来，随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马鞍山当涂青山东晋墓、太原北齐娄叡墓、咸阳北周若干云墓及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等墓葬玉器的集中出土，罗宗真、邓淑蘋、古方、王正书、张尉、江荣宗，以及包括笔者和左骏在内的一批学者，对这一时期组玉佩、玉雕龙纹及上海博物馆所藏白玉袞带鲜卑头等开展过综合或专题研究，这一状况始有改观，但仍然不很理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研究仍然相对冷寂，仍属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薄弱环节。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缺憾已由陆建芳研究员主编的《中国玉器通史》之“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得以弥补。

是卷的著者左骏先生是我的安庆同乡，2005年自郑州大学毕业来宁后，我们交往甚多。早在本科学习阶段，他就表现出对古代玉器的爱好，曾发表处女作《“西周玉琕”新考》。走上工作岗位后，他虽涉猎广泛，但从没有减少对古代玉器研究的热情，先后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历史文物》、《东南文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有独到见解的古代玉器研究论文，其中2007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玉佩研究》一文，以近年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完整组玉佩为基础，结合国内各地组玉佩构件的发现情况及历史文献资料，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组玉佩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并对玉佩组构样式进行了科学的复原研究，堪称同类玉器研究的执圭之作。

而我本人对魏晋南北朝玉器的兴趣，最早源于1998年作为骨干参与发掘的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众所周知，东晋高崧家族墓以出土大量美轮美奂的玉器和金银器而闻名于海内外。在墓葬资料整理过程中，我曾对出土玉器做过初

步的考察，特别是对组玉佩佩系方式进行首次复原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首肯。在此后出版的《六朝文物》一书中，我曾专列一节对六朝玉器的发现与类别、组玉佩及其复原研究、使用的等级制度与时代特点进行简要的概括。大概因为这个缘故，4年前，《中国玉器通史》的主编陆建芳研究员邀约我和左骏合作撰写该套书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不过，我因近年全面主持南京地区考古工作，日常管理之俗务对我学术研究拖累甚大，已难以集中抽出大量时间完成这项具有挑战性的艰巨任务，加之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已转为六朝都城、陵墓以及3~6世纪的东亚物质文化交流，故合作之事愈感力不从心，约定由我分担的章节先是一拖再拖，最后干脆完全托付给左骏了。我清晰地记得当初有些编委会专家担心本卷的分量，现在看来，这份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左骏已经不负重托，独立拿出洋洋洒洒近50万言的高质量书稿。

除开篇导读的前言外，是卷分为五章，分别从以往研究概貌、各时段玉器出土情况、玉器的类型、玉器的生产与时代特征、历史地位五个方面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玉器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讨，其中第三、四两章是全书的重点。前者开列礼仪用玉、日用玉器具、装身用玉、丧葬用玉、宗教等其他类别玉器五节，分门别类地缜密考证了文献记载及出土、传世的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玉器的形制演进、使用方法、等级制度等，后者分四节对这一时期玉料的开采运输和玉器的生产管理、琢制工艺与造型特征、前代旧玉的沿用与改制、服玉的畸形时尚等重要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书末还附有详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出土玉器，出土水晶、玛瑙、绿松石等宝石器，出土琥珀、煤精、玳瑁、珊瑚、象牙、犀角等有机类宝石器，出土玻璃器，出土滑石、云母及其他替代品，所见“玉”石造像计共七表，可供相关研究者作为工具书检索。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随文配置了300多组700余幅精美图片。这些插图主要包括彩图、线绘、墨拓三类，内容涉及玉器现状、出土现场、玉器使用和形状（复原形态）的绘画资料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些玉器线绘、墨拓，以及反映细部特征、琢制工艺的微痕图片，还是作者亲力所为，属于首次刊布，更显珍贵，不仅可以和有关文字描述相互补充说明，甚至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插图亦是全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看看书稿中多达 1200 条的页下注释、长逾数十页的附表，以及那些繁琐却规范的插图说明，我们就不能不为作者搜罗资料的异常辛劳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所感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玉器断代史研究的力作，它的精彩应该归功于全书广阔的视野，归功于作者全部心力的投入。首先，作者在是卷使用了广义的玉器范畴，其范围不仅包含以透闪石玉料为主的传统狭义“真玉”，也囊括绿松石、水晶、玛瑙、琥珀、煤精、云母、玳瑁、珊瑚、象牙、犀角、玻璃等类宝石器，以及东晋、南朝因玉料极度匮乏而作为美玉替代品的各类滑石器，游离于玉、石之间的白色大理石造像等，这个概念虽与今日玉器标准相去甚远，但据其上自铭的“玉”、“白玉”等字样看，却是时人对玉料定义的真实认知，因而具有时代感和科学性；其次，除了作为实物存在的出土和传世玉器外，作者还着意分析了仅在这一时期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中出现的玉辂、玉唾壶、玉盘、玉爵、玉麒麟、玉如意、玉几、玉床、玉枕、玉镜台、玉匣、玉钏、玉条脱、玉钱、玉佛像、车渠碗等器类的形制与使用方法。所讨论的地域范围，也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还介绍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周边邻国发现的同时期颇具地域特色的玉器；第三，作者竭尽所能搜集了涉及魏晋南北朝玉器的几乎所有考古发掘简报、报告、研究论文、图录，其中包括境内一般研究者限于条件很难寓目的《敬天格物——中国历代玉器》、《战国玉器》、《汉代玉器》、《正仓院宝物》等这样一些在境外发行的大型图录，甚至一些刚刚出土、还未及正式发表的重要玉器材料，如河北赞皇北朝墓群发现的白玉质指环、南京石子岗大型南朝画像砖墓内发现的环状白玉腕钏残件等，作者也凭其真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以确保占领玉器材料及以往学术成果的高点。可见，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玉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卷当之无愧。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部书稿的最大闪光点还在于书中异于前人的全新见解，一些发明创见给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先略举四例如下：1. 至少自汉代以来，常见一类单独佩戴的精美玉佩饰，其外形近圆形或椭圆形，中央主体有凸出之尖喙，周缘有各类镂空附饰，过去一般称为“心形佩”或“鞞形